



中国朋党史

朱子彦 - 著

首次细说中国朋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
剖析重要朝代的重要党争，把握不同朝代党争的特征、特质
凸现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朋党史

朱子彦 -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朋党史/朱子彦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8

ISBN 978 - 7 - 5473 - 0989 - 6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政治斗争—历史—中国—古代 IV. ①D691. 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4501 号

中国朋党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538 千

印 张: 21.5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989 - 6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前 言

2010年4月,我接到东方出版中心张爱民编审寄来的约稿书信,信中言道,他在主持“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已出版多部,反响很好,但列入丛书规划的《中国朋党史》找不到合适的作者人选,知晓余曾撰《朋党政治研究》,故希望能承担这一任务。接函后,对是否接受此项课题,我颇为踟蹰,主要是考虑难度较大。须知,朋党现象虽是史海中的一滴水,但却源于先秦,蔓延数千载,贯穿古今社会。1949年以降的史学工作者,大都以断代史为畛域。研究朋党者固不乏其人,但治汉史者则研究党锢之祸,治唐史者则探究牛李党争,治宋史者则剖析熙宁、元祐党争,治明史者则检讨东林党与复社,治清史者则考察康雍乾朝的党争。相关论著虽数量众多,然朋党的研究仅局限于断代。从全貌和通史的视野而言,仍属于微观或个案研究。研究断代史固然重要,但容易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难窥古代社会朋党政治的全貌,且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

在和张爱民晤谈之后,有感于他的热忱和真诚,情难推却,才惶恐受命。

撰写一部学术著作,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桐龄就撰写过《中国历代党争史》(求知学社1922年初版,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再版),201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新原点丛书”,将民国学人的学术成果选择其中精品重新整理出版,王氏的这本书(以下简称为王著)亦在其中。王著篇幅不长,观点亦无甚大的创新,但毕竟开了整体研究中国古代党争史的先河,对于后续的研究实有发凡起例的意义,说它是拓荒之作,亦

不为过。笔者不揣浅陋,先扼要检讨王著的主要观点,以及因囿于时代局限而导致的缺憾。

王著的最后部分有一个“结论”,可以将此视作王桐龄对党争现象下的结论。王氏曰:“中国全盛时代无党祸,衰弱时代或渐濒于衰弱时代有党祸;士大夫与宦官竞争时,大率士大夫常居劣败地位,宦官常占优胜地位;朝臣分党互相竞争时,则君子常败,小人常胜;竞争者之双方皆士大夫时,则比较品行高尚者常败,品行卑劣者常胜;新旧分党互相竞争时,适合于国民心理者胜,否则败;学术上分派对峙时,时常带有地方彩色。如儒学之于邹鲁,老学之于陈蔡,墨学之于宋郑,法学之于齐秦,皆以一地方为大本营进而与他学派争胜负于异地。”^①他还尝试从中国人的国民性之角度解读历代党争,曰:“吾国过去之社会状态,乃适宜于小人,不适宜于君子也”;“我国历史上现出之国民性,乃适宜于专制,不适宜于共和也”;“儒教之束缚太甚,士大夫不敢作破格之举动也”;“利己心之范围太狭隘,见近而忘远,顾现在不顾将来也”;“地方之观念太重,有族民资格,无国民资格,有村落思想,无国家思想也”;“议论多而成功少,工于措词,拙于实践,勇于争论,怯于履行也”;“胸无定见,富于雷同性,附和性与盲从性也”。^②

王氏本着探讨历代兴衰盛亡之初衷,特别注重对朋党的论述。他认为,导致中国历史乱源之一便是朋党。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朋党立,国不能一日靖矣”;“朋党之争,则上失纲而下生乱,其必然也”。^③ 20世纪40年代,王亚南著述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引起史学界的震撼,成为扛鼎之作,而朋党与官僚政治密切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言,一部官僚政治史即是一

① 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61页。

② 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散见于第162—169页。

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

部朋党史。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邓小平也曾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①历史周期律涉及的因素颇多,朋党造成的危害确实关系到历史周期律这一当代学人必须深究反思的重大课题。

王氏对历代党争的有关分析,不乏卓见史识。有的论述着墨不多,但颇具思辨性,可谓抉奥探幽,弥足珍贵。然而,王著毕竟是民国时期所撰,只能代表当时的学术素养和水准。内容实过简略,论述先秦至清代数千年的党争仅不足十四万字的篇幅,诸多地方仅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王著的第一章,论述先秦的学派门户之争,但学派之争同朋党斗争完全不同,似不应纳入以结党营私和政争为主要特征的朋党斗争的范畴之中;因王氏为清民之际文人,仍以治旧学为主,故此书用语文白相间,大段征引史料,而缺少分析,有些章节,甚至直接抄录古书。依据现当代学术框架及内在理路,对朋党史的研究理应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毫无疑问,王著对笔者仅具参考价值,无论从内容,结构和理论上来看,必须另起炉灶。因此,笔者在铺陈本书的整体结构、框架及内在理路时颇费考量,朋党史如何写,并无先例可循。按常理度之,朋党之滥觞、产生、发展、嬗变,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的特点,^②都应顾及,不能偏废,这就必须循通史模式,从先秦开始,降及有清。如此谋

①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13 年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其中特别提到,学员在校期间及结(毕)业后,一律不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所谓“小圈子”,乃是科举取士的遗风。在科举考试同科中试者,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同年”,“同年”的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成为“圈子”,即朋党。他们相互提携,打击异己,结党营私,徇私灭公,组成一张“升官网”、“利益网”、“保护网”。

②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关不同时期党争性质变化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宋之前的朋党是以血缘、姻亲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不涉及具体的政见,持不同政见而形成的派系斗争则是在宋之后出现。参见氏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1 卷,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5 页。

篇布局,完备则完备也,但另一问题亦随之产生,即极易写成本流水账,无个性,亦无特色。写党争史,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都要涉及,这是必须的。然而,如无总纲或总论,就很难纲举目张,把握全局。事实上,任何一部专著,都要有问题意识。朋党史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我以为关键是要对朋党作出界定、分析其主要特征,以及检讨它在整个中古史上起何作用,仅靠单个王朝的论述,则会导致碎片化,雪泥鸿爪,混沌不清,难辨踪迹。因此,笔者安排“导论”,题为:“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其篇幅虽较长,但却绝非可有可无,也不能省略。

朋党和党争贯穿于整个中古时代,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如何贯通这段长达数千载的朋党史亦是笔者反复拿捏掂量的重大难题。王桐龄认为:“中国全盛时代无党祸,衰弱时代或渐濒于衰弱时代有党祸。”王氏所言,虽有偏颇,然也不可视为全无道理。王朝肇基伊始,皇权强大,控制力亦强,朋党势力弱。但亦有例外,如明代“胡蓝党案”、清代顺康雍时的党争,即发生于明清王朝初中期。王朝全盛时代的党争如何处理,王朝衰弱时期的党争又如何处理,这其中的分寸感如何把握需笔者通盘思虑。我以为,首先必须突破以往断代史研究的框架,侧重于整体分析,从宏观层面上论述朋党产生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各类党争的特点、类型及其规律,凸现出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脉络和全貌。

拙著梳理出这样几方面的学术理路和思考:其一,朋党并非产生于帝制社会,早在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有了朋党的雏形,三代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已具有后世党争的特点,朋党政治在春秋战国之际基本形成,以后绵延、贯穿于整个帝制社会。其二,对传统意义上的朋党作出新的界定,朋党的范畴不应仅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宦)党、奸党等均属朋党之列。其三,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与乡土观念,

以及权力、财富的争夺和不断再分配,是产生朋党的最主要原因。其四,不认同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党争之是非。欧阳修的《朋党论》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朋党分成“君子”与“小人”,肯定“君子之朋党”。余认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二律背反现象的大量存在。儒家传统虽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政治理想,但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儒学清流士人为了维护所谓的“王道”,又不得不结朋聚党。在王朝出现社会危机时,顽固的保守派反对变革,改革派冀图用结党的方式来增强实力,与反对派抗衡。然而,新党内部亦非铁板一块,其持续不断的派系之争,最终断送了改革进程。可见,改革派也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君子之朋党”。朋党特征就是门户至上,党同伐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无君子与小人之分。

在分章论述时,本书兼顾重点和特例。凡历史上重大党争事件,诸如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熙宁变法、明代东林党等,都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势难回避,必须浓墨重彩。然而研究此类党争,前贤时彦有大量论著,说汗牛充栋亦不为过。为朋党史体例所囿,笔者自然不能快意畅言,故只能精炼之,浓缩之,相对于洋洋数十万字断代史的朋党专著,本书的断代论述只能成为“微型景观”。承蒙责编谬赞,谓余治史能断通结合,其实亦言过其实了,吾以治汉魏、明史见长,余则聊以充数而已,岂有全通之才?基于此因,则须扬长避短,故笔者对东汉、三国及明代的党争着墨较多,用力较勤,抑或有自己的些许见解。^①

在建构本书学术框架时,令笔者最伤神思的是,限于学养以及对史料的稔熟程度,不可能顾及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党争,因此只得有所取舍,南北朝至隋及辽金蒙元王朝,皆是笔者治史从未涉及的领域,

^① 笔者曾先后撰写多篇有关东汉、三国及明代党争的学术论文,大都在史学核心期刊上发表,故有一定的学术沉淀和积累。

加之本人深谙并严格恪守学术规范，绝不为所谓借鸡生蛋之事，故只得忍痛将上述朝代的党争割舍了。吾之所弃，情非得已，绝非这个历史阶段没有党争，而是笔者功力不逮，至于这样的缺憾，只能容日后的高明者来弥补了。

尽管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更多地突出农民战争、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社会经济形态等所谓“五朵金花”的研究，关于王朝统治集团党争的探讨因与时势违碍而一度转入沉寂，学者也很难公开征引陈寅恪的研究。但陈寅恪的学说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学者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特别是陈寅恪先生通过考索、思辨，将个案分析置于历史文化变迁视野下的研究方法，例如《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两部巨著，虽择选的人物，并不享有盛名，但经陈寅恪的大手笔，将个案演绎成鸿篇巨制，确实令当代学人仰之弥高，敬佩不已。^① 总之，将个案分析与时代政治格局的整体把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隐抉微，对笔者极具启发意义。本书个案分析有四：其一为“月旦评：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其二为“个案研究：桓氏集团之兴亡”；其三为“李商隐：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其四为“明代君主专制与胡蓝党案”。一、二、四例曾作为单篇论文均刊于《学术月刊》，三例是新撰写的，将李商隐的人生际遇置于唐代最为激烈的牛李党争背景下剖析，从侧面解构牛李党争，不知能否构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

我认为，当代学人还应适当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因为在现代的学术标准下，我们的研究已经不能停留在“闭关锁国”的层面上。正如李泽厚在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写的序中指出：中国曾经

^① 尤为敬佩的是陈寅恪的发覆之功。何谓发覆？陈门弟子蔡鸿生在其《仰望陈寅恪》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谈“发覆的魅力”。其中言道：“他读破了世人皆可得而见之的典籍，如《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之类，完全不靠孤本秘笈，就能化腐为奇，举重若轻地把历史事物从潜在的状态导向现实的状态，从在场的东西引出不在场的东西。这种奇妙的东西，不能说是史从思出，而是学者的精思复活了死去的历史。”

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关于中国的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人的事情,这是一个世界汉学界的共同话题,盲目地推崇或者鄙视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都传达着一种不自信的心态。作为中国的史学研究者,我们必须努力去应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学术交流与挑战。以朋党研究而言,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川胜义雄,英国汉学家丹尼斯·克利斯平·崔瑞德对于党争和清议运动的历史考察往往置于特定的语境与学术脉络中加以诠释,其背后的理论关怀与中国学者不尽相同,我们可以将其研究的理路“拿来”对照比证,在学术上进行互补,以形成多元的研究方法。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高原建设项目(2015—2018)的支持;责任编辑张爱民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朱子彦

丙申季春记于海上新梅公寓

导论 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

一 何谓朋党

朋党,是中国古代社会引人注目的突出政治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滥觞于夏商周三代社会的朋党和党争,历经汉唐,下逮明清,始终盛而不衰,且愈演愈烈,在封建王朝的肌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整体和宏观的视野而言,朋党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朋党和人们熟悉的政治集团、宗派、帮派、山头、团伙、圈子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大多数党争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①没有什么固定阵线、道德原则可言,即所谓“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拙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②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导致中国历史乱源之一便是朋党。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党争也有邪正是非之分,带有某些清流士大夫为救世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反对宦官专权,希望澄清吏治,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等特征。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北宋的新旧党争,晚明东林党、复社反对阉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不宜一概抹杀,应给予适当的正确评价。

中国朋党历时弥久,延绵不绝,时空跨度之长,几乎与整个古代

① 中国历史上因变法改革而导致的党争,如吴起、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大相径庭,应加以区别。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文宗”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

社会相始终。朋党与党争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课题。要系统完整地论述中国朋党史,绝非易事,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故我们在论述朋党史时,必须要讲清楚朋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并将其置于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宏大视野下,从多个侧面来考察探讨与朋党相关的若干问题。

首先须厘定朋党与政党的界限和区别。“党”这个字,在现今人们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几乎成了“政党”的同义语,诸如报刊上常见的“社会党”、“民主党”之类的“党”。这是现代政治中的特有现象。古代并无政党可言,然而古代史书中却常见到“党”的字样,那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如东汉的“钩党”,唐代的“牛党”、“李党”,北宋的“元祐党人”,南宋的“伪学党”,明代的“东林党”等,都是朋党,或被政敌诬为朋党。汉字的特性往往是一字多义,在《辞海》中“党”这个字的释义多达六项,既有政党之意,也有朋党、朋辈之意。现代人对“党”字的直觉印象往往侧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英文中政党的“党”是 Parties,朋党的“党”是 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不至于把朋党混为政党。^①

那么,为何朋党完全不同于政党?这是因为,政党是近代政治斗争的产物。从世界政治史的视角来看,政党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议会的产生。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议会制度的创立。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②英国议会约建立于13世纪。议会的诞生为英国各阶层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平台,英国创立于17世纪70年代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二,从近代政治斗争的性质来看,政党之间的斗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① 参见樊树志:《晚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616页。

^② 《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页。

与冲突,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同传统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其三,政党都有自己的党章、党纲、组织机构,并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党的纪律作出规定,是一个结构健全、组织严密、宗旨明确的政治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始于1894年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以及稍后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各派纷纷组织政党,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应运而起。民国初年,党派复杂,名类众多,这已非本书的研究范畴,在此不赘。

王桐龄(1878—1953)是迄今为止,唯一撰写过《中国历代党争史》^①的学者,他认为朋党之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其因有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官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皆不容杂入其间。”^②梁启超认为,朋党特征有五:“一曰以个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中心;二曰不许敌党存在;三曰以阴险狠戾之手段相竞争;四曰党内复有党;五曰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易。”^③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特别指出朋党和政党的区别:“牛党、李党这种派别不论在当世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9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该书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

① 参见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② 王桐龄:《中国史》第三编,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109页。

③ 梁启超:《警告政党及政党员》,《庸言》第1年,第7号。

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①西方学者的论述的语境、语言有其特点,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别开生面,极富启发意义的。

在厘定朋党有别于政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朋党与近代社会“会党”的性质也迥然有别。会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会党具有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在此以前,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通称“会”,自兴中会与天地会首领联络后,始称“会党”。会党除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外,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式领导,首领由大首领加封,一切唯首领之命是从;组织成员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为主体;有很强的地方性,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等特征。兴中会成立后,很注意联络会党,以扩大势力和影响。孙中山曾说:“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②后来,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主要依靠的力量就是会党。

说到会党,还要介绍一下“跑江湖”的概念。跑江湖指旧时以卖艺、算卦、相面、卖药、走镖等为职业,来往各地谋求生活。江湖人包含了社会流动阶层中几乎所有的职业,而会党中人大部分都是江湖人。会党中人可以说品流复杂,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可以称得上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旧社会比较著名的会党组织主要有洪门、青

^①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5—662页。

^② 《总理全集》第1集,第920页。

帮、哥老会等。

由此可见,朋党完全不同于会党。其主要区别有三:其一,朋党由中古社会统治阶级中的各个政治集团所组成,其主要成员为官僚士大夫,属于上层社会;会党乃民间秘密团体,其成员来自民间底层的三教九流,带有黑社会性质,亦可称之为“江湖帮”。其二,朋党跨时久长,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会党兴起于近代社会,新中国建立后,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即告消亡。其三,朋党中除围绕变法改革的新旧党争外,大多数是权力之争、意气之争,几无非曲直可言;而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孙中山曾经借助会党的力量,发动起义,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既然朋党完全不同于政党和会党,那么,朋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征呢?笔者以为,朋党是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利害冲突、政见分歧、地域偏见、亲缘关系、人身依附、门第观念等都可以成为朋党的起因。朋党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为目的,以党同伐异为特征,以打击、残害政敌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朋党存在,但从来无人敢于公开提出纲领、发表宣言,打出朋党的旗帜。

朋党与政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实际上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且并不具有合法性。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派反对另一派,最阴险的手段,莫过于指控对方结成朋党,以便利用皇帝痛恨朋党的心理给予名正言顺地打击。正如明人吴桂森所言:“邪人害正,其妙法无过一党字,于是世人摇手闭目,畏一‘党’字如仇。”^①可见在君主专制时代,朋党被视作牛鬼蛇神、毒蛇猛兽,无论何人,一旦被视作朋比结党,就如同犯下弥天之罪。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为

^① 吴桂森:《息斋笔记》卷上。

防止大权旁落，都严禁臣下朋党比周。如明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在召见大小臣工时，其厌恶朋党与门户的心情溢于言表：“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到(倒)不忧国，只是分门立户，动说甚么党，甚么东林，何益国家事情！”他屡屡下旨禁说门户，以致“党”之一字，臣下都不敢在奏章中提及。^①清康熙帝对朋党门户也深恶痛绝。他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②而雍正帝更是从天尊地卑，君臣定分的论调出发，亲自撰写《御制朋党论》，对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猛烈抨击。历朝统治者如此严禁朋党，无非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考虑。

尽管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分裂成许多对立的政治派别，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朋党，但朝臣们都对此讳莫如深，绝不敢声称自己结党，以避免触犯朝廷禁忌，遭致不测之祸。而敌对势力则尽量给对方加上朋党之名，以便迫害异己，直至置其于死地。如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推行新政，遭到保守派的仇视，右正言钱明逸遂上疏攻击范仲淹等人，云其“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③这正好触及仁宗的心病，致使主持新政的官员纷纷遭到贬谪。欧阳修在揭露保守派的卑鄙伎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小人谗害，其识不远，欲广陷善良，则指为朋党……唯指为朋党，则可尽逐。”^④

在儒学士大夫阶层中，毕竟大部分人都恪守传统的政治道德，所以也不敢为朋党唱赞歌。甚至连士大夫之间的一般交游都谨小慎微。如三国时阮武曾言：“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游，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

① 参见《崇祯长编》卷17，《明实录》附录之四。

② 蒋良骐：《康熙朝《东华录》，卷20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④ 《宋史纪事本末》卷29《庆历党议》。

源。”^①明末学者吴麟徵也认为：“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②可见，朋党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非法组织。

宋仁宗时，欧阳修上《朋党论》，宣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也就是说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党，真可谓是惊世骇俗之谈。然而欧阳修把自己包括在内的“君子之朋”，其联结点仅限于“以同道为朋”，即只承认他们具有忠君爱国的共同思想基础，相互激励、同心同德地为国操劳而已，并不是承认他们之间有什么朋党组织，进行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朋党既是有形的，历代封建王朝确实都有朋党的存在；但它又是无形的，因为除了敌对双方互加朋党之名以外，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属于通常意义上的以结党营私为目的的朋党中的一员。

不管古人看法如何，朋党的存在总是一个历史事实。按照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朋党指的是官僚士大夫结党，例如樊树志认为：“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③樊树志指出的晚明史上的党只是朋党，而并非是政党，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朋党仅是官僚结成的派系，把官僚集团视之为朋党的全部，那就是以偏概全了。因为除此以外，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外戚集团、宦官集团、阉党等等，无不属于朋党之列。如果将党争只视作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那东汉的钩党同宦官的斗争，晚明东林党人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斗争算什么？难道不算党争吗？另外，不少学者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党争乃是东汉的党锢之祸，这就容易令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直到东汉末年朋党才出现于政治舞台，这就将朋党存在的历史大大缩短了。

① 阮武：《政论》，《全三国文》卷44。

② 吴麟徵：《家诫要言》，《学海类编》本。

③ 樊树志：《晚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页。